



黄亭子札记

跨校双学位

王凤生

1992年11月10日下午三点，我去小西天附近的262医院，看望正在生病住院的孙明经老先生，遇见陪护的孙先生的儿子孙健三。他和我谈起，电影学院能不能与清华联合培养学生？后来我得知这是孙明经先生多年的宿愿。次日下午四点，孙健三又与表演系教师刘汁子来到我的办公室，仍然是谈论与清华联合培养学生之事。他们的想法和我产生共鸣，我下决心推动此事。

植物学上，“嫁接”可以培育新品种。人才培养，难道不可以“嫁接”吗？

11月13日上午我找到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同志，征询他对于两校联合培养学生的意见。在听了我的初步设想后，他表示赞成。11月18日上午，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教育工作会闭幕会期间，我与清华张孝文校长谈及两校联合培养学生之事，他同样表示赞成。

1993年2月24日，我向时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

同志报告了拟办跨校双学位的事情。

1993年2月下旬、3月上旬先后与北大党委书记汪家镠、副书记任彦申同志等通电话，商谈电影学院与北大联合培养学生之事。3月15日下午，我与王伟国副院长、郑洞天教授等人去北大和王义道副校长正式谈跨校双学位的可行性与具体实施办法。

在办公会上做出决定与清华、北大两校办跨校双学位之后，便开始了与两校教务部门具体商谈办学方案，以及向广电部、国家教委等主管部委请示报告，履行一系列必要的手续，最后得到准予办班的正式批复。

由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学制各为5年和4年，所以分别采用了“5+1”、“4+1”的培养模式，学制延长1年，即在原校读最后两年原有学位的同时，攻读电影学院的第二学士学位。在结束原校的全部课程、获得第一学位后，最后一年，

完全转入北京电影学院，完成第二学士学位的学习任务。

1993年6月27日，8月27日分别举行了清华、北大双学位班的招生专业考试。最终与清华合办电影录音双学位班录取学生8名，均为三年级的学生，分别来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物理、建筑、工程物理、自动化、土木、化学工程和外语系。与北大合办的电影剧作专业双学位班录取学生12名，同样是三年级的学生，分别来自中文、地质学、英语、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哲学、城市与环境、信息管理、国政等系。表演专业双学位，由于两校能够通过专业考试的考生数量均太少而未能办成。

9月29日晚，在电影学院举行了两个跨校双学位班的开学典礼。一个新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就这样开始了。

什么样的人能够作为艺术人才的培养对象？既要有艺术才能，更不能不重视文化基础。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需要有基

本的艺术素养,艺术“天分”。没有这个“天分”,文化课考分再高,花再大的力气,也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艺术人才。同时,如果只有某些艺术才能,而无好的文化基础,即使成才,也难成大才。

清华大学不是艺术类院校,但在她的历史上却培养出了许多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知名的艺术家,洪森、李健吾、黄自、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朱湘、曹禺、钱钟书、杨绛、张肖虎、英若诚、张骏祥、胡芝风……还可以举出许多。

洪森是清华旧制1916年的毕业生,是我国话剧运动、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写过《无牵桥》《包得行》等剧本,翻译、改编、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一剧,拍过《铁板红泪录》《鸡鸣早看天》等影片。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清华国学院导师之一赵元任,曾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

师,清华心理学及物理学教授,哈佛物理讲师、中文系教授。他在清华国学院还教授音乐课。由他作曲、刘半农作词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由徐志摩作词的《海韵》成为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典范,出版有《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我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称他是“中国的舒伯特”。

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当时是清华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是中国新月派诗人的中坚。钱钟书、万家宝(曹禺)、季羨林读书时被誉为外文系学生中的“三杰”。曹禺是在就读清华外文系第四年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作话剧《雷雨》的,那时他23岁。他在回忆写作《雷雨》的文章《“水木清华”与〈雷雨〉》(《清华校友通讯》复10期)中写道:“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现清华图书馆老馆二楼,“清华校友文库”阅览室内东边一排,第一

张阅览桌上——作者注),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

胡芝风,国家一级演员,研究员(戏曲理论),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她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戏曲理论研究员。她演出的京剧《李慧娘》被拍成电影,获最佳戏曲片奖;她的《红梅阁》也被拍成电影;她导演的评剧《闯法场》、河北梆子《梦蝶劈棺》、晋剧《六月雪》、评剧《生死令》等剧的主演均获得梅花奖。她还发表过《戏曲演员创造角色论》、《胡芝风谈艺》等多部专著。

我之所以列举出这一些清华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无非是想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像清华、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理工科学校同样可以培养出艺术家,甚至是杰出的艺术家;第二,这些人能够由清华走向艺术殿堂,一是因为他们在中小

学阶段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二是进清华后，又继续接受清华的优质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厚积薄发，才能在后来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这也正是促使我想积极尝试将北大、清华的学生“嫁接”到电影学院，看看能否产生出“新品种”的动力来源。

双学位班的学生在原来的学校——北大、清华，是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课程的，来到电影学院又学习艺术类课程，跨学科使他们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具有创造性。这一点也正是“跨校双学位”的优势所在。

他们欠缺的是，入学专业考试不如电影学院学生严格，不是在更多考生中经过层层筛选，百里挑一出来的。所以从总体上讲，他们的电影艺术专业水准不如电影学院的学生。

经过三年的培养，头两年在原校，第三年在电影学院，两个双学位班的学生毕业了，拿到了两个学士学位，毕业后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有的到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师，有的继续读研究生，有的出国继续深造。录音专业的原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童雷，在清华读

书时是学生军乐队的成员，留电影学院任教师，前几年已经担任录音系主任，现在任电影学院声音学院院长，成为学校的骨干。

由于两校课程安排都很紧，特别是临近毕业的最后阶段，排课难度大，电影学院的课往往要排到晚上。而且学校相距较远，学生骑自行车往返两校间，负担过重。加上电影学院本身的条件尚有许多困难等诸多因素，使得双学位班只办了一期，未能继续办下去，留下了遗憾。

何东昌同志对于这个尝试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与支持，多次询问情况。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几次催促我要对双学位班的毕业生做跟踪调查，总结经验。在2008年2月7日（正月初一），我去探望他时，他还特别谈到：

“你的那个双学位班，从北大、清华招学生，到电影学院再读一个艺术类的专业，毕业时拿两个学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跨校双学位是属于正在探索中的事物，但在一开始的1994年初，在电影学院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事情是由报刊上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93年12月3日，《经济日报》发表

了“北大清华生加盟电影学院”一文。1993年第5期《文艺学习》刊登了“1993，中国电影到底怎么了！”其他有的报刊也对此进行了转载。文中某些提法欠妥，把双学位这件事提到了不应有的高度，把我个人的作用也提到了十分不恰当的地位。有的教工和学生认为文章是在贬低电影学院和它的学生，损害了电影学院的名誉。提出“抗议”甚至保留“起诉”两位作者及有关报刊的权利。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先办校内的双学位，而办跨校双学位？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可以来电影学院学习，为什么我们电影学院的学生不可以去北大、清华学习等等。

经过做工作，事情很快过去了。但对于我，总结工作，检讨得失，除去某些其他因素，确有教训值得记取：操之过急，工作不到位，未能事先在电影学院的师生中间做充分地说明，讲清楚做这件事的理由。宣传，本应先做后说，或只做不说。但这件事，刚刚起步，还未见任何成效，报刊就大肆报道，过早地下结论，不恰当地拔高等等，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2016.6.9)